

呼籲
答復

於對授教九明昆

的題問濟經價物

孟西楊・桐良林・元啓伍

民覺鮑・昌德張・青樹李

光世戴・通孝費・秋來沈

昆明九教授

對於物價及經濟問題的呼籲

一九四五年七月

求真出版社出版

提

戰時的物價經濟問題，是每一個中國人民所十分關心的切身問題。我國著名的經濟學者，國立西南聯大伍啓元等九教授，對於這個重大而迫切的問題，曾經一再，再而三地發出了義正辭嚴的呼籲。此項歷史性的文獻在報紙上發表以來，特在政府和人民中間，引起強烈的震動和反響，一直刊現社。金融界，工商界密切地注意它，學衡界，輿論界熱烈地討論它，國家總動員會議的官員們反顧地研究它，公教人員和將領士兵感激而且擁護它。其影響之大，概可想見。

這由於昆明九教授的主張，反映了廣大人民的呼聲。他們主張懲治貪污，主張改善士兵生活和公教人員的待遇，主張取締通貨膨脹，主張取締統制物價，主張剷除「既得利益集團」的惡勢力，主張增加富裕階級負担的租稅，主張經濟民主，平均社會財富和實行不流血的社會經濟革命……這些，和今天廣大人民的民主運動，在基本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

現在，九教授把他們三度呼籲的原文重加訂正，並加長篇導言，彙集成冊，交由本社出版。我們很樂意而且很榮幸地，把這本意義重大的文獻介紹給全國讀者。

求真出版社編輯部。一九四五年五月。

目錄

導言

我們對於當前物價問題的意見

我們對於物價問題的再度呼籲

現階段的物價及經濟問題

(附錄)呼籲

伍啓元 李樹青 費孝通

林良桐 張德昌 費孝通

楊西孟 鮑覺民 戴世光 費孝通

楊西孟 戴世光 李樹青

鮑覺民 伍啓元

戴世光 鮑覺民 費孝通
伍啓元 楊西孟

詹同章

RW744119-1-14

導言

在過去三年間，我們對於我國的物價問題日趨嚴重，使我國戰時經濟及抗建前途遭受惡劣的影響，曾三度就物價及經濟問題發出緊急的呼籲。這三次的呼籲均曾先後寄交重慶大公報發表。現在把這三篇的原文集合在一起，刊行這本小冊。

我們所以把這三篇文字印成小冊，有四個原因：第一、我們的意見是有一貫性的。這三篇文字必須合起來看，然後才能代表我們的思想與主張。過去這三篇文字發表的時間相隔頗久，讀者不易全部找得；現在印在一起，讀者便容易看到我們對這個問題前後的一貫見解。第二、我們的主張雖然沒有被政府即時加以採納，但將生研究中國戰時經濟的人，對我們所作的分析與主張，恐不會完全忽略。所以這三篇文字還值得印成小冊，以便保存。第三、過去在報章發表時，因種種關係，原文有若干字句沒有刊出。現在把這些文字印成小冊，使我們有一個機會把原文全部印出。第四、在

我們前兩篇文字發表後，各方曾有許多討論與批評。現在印成小冊，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對若干批評加以答覆。

在我們第一篇文字發表後，曾引起各方的討論。政府方面除了某某等會報曾提出加以研究外，對我們的主張並沒有甚麼公開的表示。但在雜誌報章上則有許多同情的及商討的意見發表。

大體說來，各方對我們第一篇文字的分析部份，不同意的地方很少，但對於我們所提出增稅和統制兩項辦法，則有許多討論。在原則上，增稅的主張各方沒有甚麼反對。有些人並說增稅的主張「是當前戰時財政的唯一出路，是物價問題的根本之計，是社會公平的天經地義，而應該為每一個中國國民所擁護的。」但對運用租稅的程度及租稅征課的種類，各方意見却不盡相同。有些人認為增稅固然是應該的，但單靠徵稅是不夠的，必須輔之以發行公債，纔能平衡國家的收支。有些人認為增稅雖然是有益的，但不應徵課我們所建國的各種租稅，而應徵課其他租稅。至於統制的辦法，千家駒等九先生在「論當前物價問題」中，曾表示如次的意見：

「統制應當加強，在原則上也是沒有問題的。但過去由於人事機構之不當，其結果是不能令人滿意的。有人說：假使五年來的經濟政策，不採取似是而非的統制，其結果亦許能較現況

爲佳。此說不無原因。

對以上這些批評，我們願意分別地簡單答覆如下：

一、對於原理由稅不難確有財政支出，必須輔以發行公債甚且增發「票」的解釋，我們是不能同意的。我們認爲，稅與債與發鈔，不是屬於增加財政不同的問題，它們都是徵取國民收入或資產以供國家使用的手段。徵稅是明自地、強制地、和無償地徵取國民收入或資產的一部分；發鈔也是明自地徵取國民收入或資產的一部分，但不一定是強制的，並且將來是有消滅的。發鈔在表面上雖然不是由人民繳納的或交付與政府，但實際上也是政府徵取到國民收入或資產的一種辦法，它和徵稅一樣，也是強制的和無償的，不過不是明自徵取而是間接徵取而已。因此發鈔及發「票」都是一種「徵稅」，凡是發債與發「票」能夠做到的事，只要政府有權力與決心，也可用稅做到。徵稅與債與發鈔的矛盾，不在於應付財政支出與否，而在於徵收的便利與對社會經濟的影響。從財務行政的便利說，徵稅不如發債，發債不如發鈔。反對以徵稅爲籌措戰費主要工具的人，大都是從這個觀點立論的。我們的着眼點却在社會經濟方面。就社會經濟的影響說，發鈔因使財政重且落在中下階層的身上，通常不如發債，而發債通常又不如徵稅。所以我們着重徵稅的主張。不但如此，到了我們寫這篇文字的時候，我國經過了五年的通貨膨脹，中下階層大都已耗盡他們的儲蓄並降低他們的生活

至最低合理水準之下。他們差不多已完全無力再負擔戰費，同時富裕階級也已積聚了巨額的財富。在這種情形之下，繼續戰費不但應加重租稅，而且應該儘量徵收由富裕階級負擔的租稅。

我們在第一篇文字中所提出的三種租稅，是有特別用途的。我們所主張的一般財產稅，是用來把富裕階級過重所獲取的國家財政歸國庫；我們所主張的所得稅，是用來徵收富裕階級今後收益；我們所主張的徵收的奢侈品稅，是用來限制富裕階級的生活，使他們不要過份浪費。我們承認由富裕階級負擔的直達稅，通常是比較難以徵收的，因為這需要計算他們的財產與收益，而財產與收益的估計是相當困難的。但這些困難是可以克服的。事實上由於通貨膨脹，社會財富已經集中於少數人的手裏。在這種情形下，徵稅的主要困難倒不在財務行政方面（因為少數人的財產是不難調查的），而是在政治方面。祇要政府有決心克服「既得利益」集團的阻力，則徵收戰時一般財產稅是可以辦到的。至於具體辦法，如我們第三篇文字所提到，可謂提高免稅額及自報公布與檢舉等方法以便利其進行。

對於過去統制不能令人注意的地方，我們也是很理解的。在「既得利益」集團控制我國經濟的今日，在貪污舞弊流行的今日，任何期望良好的統制，都有被既得利益集團用來營私舞弊的可能。但「國家不能因噎廢食」。正確的法，正如我們一再的指出，應該是消滅既得利益集團的勢力，

剷除貪污的根源。這樣統制就不會產生嚴重的流弊。

第二篇文字發表後，引起各方更多的討論。在政府方面，國家總動員會議曾開會討論我們的主張。這個貨物價管制最高責任的機構，經由其代理秘書長於五月二十一日作如次的聲明：

「物價波動的因素很複雜，不僅由於通貨與供求等經濟關係，管制機關自應針對事實，尋求解決途徑，但政府任何措施，總須考慮周詳，不能隨便決定。各方意見，多足重視，負責人員無不虛心接納，儘量採用，且其可行者政府亦早見到，已在推行。譬如：（一）改變徵稅方法，商由各業攤認，手續簡便，更可避免若干流弊。（二）擴大徵實，一切可徵收實物者，都徵收實物，可增加徵額者，便增加徵額。（三）向友邦交涉購運大量布疋藥品及五金材料，政府掌握充分物資，即可減少通貨之發行，促使物價之趨平。此亦不過略舉數端耳。又如調整生產，非但除有關國防民生之必要工廠外，不予扶助，更決定取締不必要之工廠，此較諸聽其自然自滅者，尤進一步。然而被取締之工廠，其機器不可任其廢棄，員工必須妥為安置，否則機器浪費固然是可惜，員工失業將更成爲嚴重問題，此在負責機關，皆不能不預爲諒測者也。至於向人民借貸與徵用，原是戰時財政的一種方法，原則無待討論，祇須研究如何實行。戰府兼顧

國計民生，非萬不得已不輕易過分的加重人民負擔，而且法治國家，一取一予，俱應依照法定手續，政府於此，其權力非無限制。近來有人主張強使富戶按月借給政府預定之巨款，在西南聯大五教授發表論文之前，我們已譯着類似的建議，此與有鑲出錢之道理相合，政府所行稅率之累進制，即是重課富戶，勸債勸儲亦是對富戶而發。但由政府定一富戶名單，責以定額之借款，則不如言之之易。蓋當有確實之財產調查，更須有合法之依據，縱使名單果能公布，亦應許其反證申訴，方合民主精神，結果必將遷延曠日，難於穩定執行。至於封存鈔票停止發行一點，戰時各國都不免增加發行，祇能作到儘量少發行，政府不但不願多發行，且極願不再增加發行，不過封存發行之鈔券，同時禁止提取銀行存款，一切經濟活動立將陷於停頓，影響所及，必不止工廠商店之倒閉而已。抑且今日通貨問題，其癥結在於法幣不能回籠，銀行不易吸收存款，若銀行掌握民間多數法幣，通貨作果便不會劇烈，若法幣太多流散民間，銀行存款盡歸政府運用，其數亦至有限。加以富戶借款之障礙重重，一旦鈔券封存後之應急處置，恐不能行之如意，而其背後問題之如何解決，則更大為可慮。政府歷年來金融政策，極注重圖便法幣回籠，如何使其行之更有效，實吾人所懸望於社會之共同努力。聯大五教授之論點，凡事實看到之處，與政府現行方針初無二致，惟由於戰時許多情形不能完全披露，以至吾人若干觀

察不盡相同，讀者人的時專家學者多提供意見，不特表現民主精神，亦可與實際有所裨益也。除了官方的聲援外，還有許多私人的批評。各方的批評大都集中於兩點：（一）對我們所主張在總急方面宣告停止通貨膨脹，對付未發行的票，並限制銀行存款，現各點，認為有使膨脹支出無法應付的困難。（二）對我們所主張穩定客戶名單向客戶強迫借款及集錄一般財產幾點，認為「過份的加重人民負擔」，違反「民主精神」，認為在我國財產沒有確實調查的情形下無法實行。對於這兩點批評，我們也加以簡單的答覆。

立即停止通貨膨脹的主張，如果當作一個獨立的政策去看，當然是令人驚訝的。因為如果沒有把戰時的籌措事先妥為計劃便立刻停止通貨膨脹，則必會引起嚴重的困難。但我們在提出立刻停止通貨膨脹的要求時，我們同時提出政府如何加強使客戶按月借貸等辦法以供應軍費支出，因此通貨膨脹雖然停止，國家作戰的努力顯然不會受到不利的影响。

我們所以主張宣告停止通貨膨脹，這有心理上的理由，因為明白作這種宣告可以增高人民對法幣的信心，減少投機的傾向，並消除財政上信賴發行的搖搖。

對於反對向客戶強迫借款及反對集錄財產的理由，我們更不能接受。總動員會議的代言人認

像這些辦法增加人民負擔，這種說法不管是否把「人民」看等於富裕階級，只要當階級沒有負擔便是「人民」沒有負擔。實際上除了利用國家庇護以積聚財富的富裕階級外，中國還有四萬萬數千萬沒有被那位代言人重顧的中下層階級的人民。大家要認清如不使資產階級負起戰費，則戰費的負擔有一部份必然會經由必要的增稅與物價的高漲歸到前線苦戰的官兵及後方守法的公教人員，而另一部份又經由貪污、剝削、剝削、使整個程序轉嫁到一般勞苦的人民（特別是農民）。這些人民交付戰費的方式，有時且包括破產、疾病、與死亡。不知這些中下階層是否國家的人民？爲甚麼他們的負擔又如此輕易過份的加重？何以這些人的負担加重了數年而竟不加注意？我們問是否只加重富裕階級負擔的要求後便感覺「加重人民負擔」？便感覺違反「民主精神」？我們要問是否只有由富裕階級控制政治與經濟的「民主」才算「民主」？我們要問如果沒有經濟民主的所謂「民主」是否今日中國大眾人民所能接受的「民主」？

我們也承認今日中國私人的財產並沒有確實的調查，但這不能拿來作拒絕實施富戶強迫借款或實施戰時一般財產稅的藉口。關於這一點，我們認爲章同章先生在他的「呼籲」一文中的第三及第四節有很好的說明。周子若我們再加以重述。詹先生係重慶某大學的肄業生，他這篇「呼籲」係在我們第二次呼籲發表後發表的。他以青年的熱誠，言人所不敢言，言人所未盡言。他的「呼籲」實

係一篇值得介紹的文章，因此我們把它放在附錄裏。

在這裏我們必須指出一點，即今日中下階層的不滿已至極點，只是實施向富戶借款已不能滿足中下階層的要求。因此我們在第三次呼籲中主張立即直接實施戰時財產稅。

我們歷次提出呼籲時，都有人認為我們的主張有些激烈，不易施行。但在每次呼籲提出相當時間以後，則所謂激烈的思想已被人看為很平常的思想了。例如我們主張擴大軍事支出，我們主張改善士兵待遇，我們主張懲治貪污，我們主張統制物價，……現在政府負責的人也認為是當然的事了。相信不久的將來，我們所提出消除既得利益集團的勢力，平均社會財富的分配，增加由富裕階級負擔的租稅，實行不流血的社會經濟革命等主張，也不會再被人認為激烈，而且還會被人認為過於『保守』了！

這本小冊是在第三篇文字寫成後即交書店印行的。對這次的反響我們還無法預先知道，因此也就無法預先加以答覆。

在第一篇文字中，簽名的共有九人。後來周張德昌、林良桐、和沈來秋三位先生都離開了這裏。

的大學，更加以戰時通訊困難，無法用通訊方法徵求他們的同意，所以在後兩篇文字中，他們三位都沒有列名。此外還有兩位曾先後有美國之行，所以在第二及在第三篇文字中，列名的都僅有五個人。

集體寫作在中國是一件不多見的事。我們總算做了幾次的嘗試。至少就我們自己說，這幾次集體寫作的經驗是很愉快的。因為它不只寫出了我們彼此心中的思想，它並且寫出了許多同胞的共同思想。如果我們在這幾篇文字中有任何貢獻的話，那麼我們的貢獻就在替大眾說了大眾所要說的話。替大眾說話，是今日念書的人應有的責任：這是「義不容辭」的。

一九三五年五月三日於昆明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我們對於當前物價問題的意見

伍啓元 李樹青 沈來秋

林其樹 張德昌 費孝通

楊西孟 鮑覺民 戴世光

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抗戰以來，我國在軍事方面的成就，實係歷史上少有的偉蹟。於此，我們謹向勞苦功高的最高統帥與前線抗敵將士，深表敬意。在戰爭期間，前方後方應屬一體重要。前方的成就既如此輝煌偉大，假若後方經濟與社會情形能與軍事配合，作到日益堅強與時俱進的地步，則我國抗建大業的完成，實可拭目而待的。不幸，目前後方情形遠非如此：由於物價的劇烈變動，整個後方的社會經濟都作畸形的發展，其影響所及，甚至連撫人心也有敗壞的趨勢。因此以往，不惟目前抗戰受其影響，而且今後建國大計，亦將遭受打擊。我們都是在大學經濟系和社會學系任教的人，就觀察和分

析所得，深感今日後方經濟社會的演變已經到了一個嚴重的階段。此項關係重大的問題，若不及時澈底解決，待其影響已成，惡象環生，將來縱有更大的決心與加倍的努力，亦將失之過晚，追悔無及。我們鑒於局勢如此，爰本匹夫有責之義，敷陳一得之愚，藉供政府採擇，並希社會人士共同討論。

○物價問題，就一般人看來，只是一個物價高漲和某些階層生活艱難的問題。其實物價問題非如此簡單。就本質上說，我們認為物價問題實包含（一）物價上漲高度，（二）物價上漲速率，（三）各種價格上漲程度不齊等問題。就影響上說，物價問題實包含生產、分配不均，和其他社會經濟問題。

首先，就物價上漲的高度來說，自民國二十七年春季起，國內各地物價開始上漲。到了現在，昆明物價平均約近戰前六十倍，重慶物價平均為戰前三十倍，後方其他各地為戰前三三十倍不等。拿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各國物價上漲程度來比較，英國物價約為戰前兩倍，法國約為戰前三倍半，德國約為二倍半。她們都已經過四年劇烈的戰爭，物價的增漲也不過如此。所以就戰時物價

來說，我國物價的增漲實已到了驚人的高度了。

其次，就物價上漲的速率來說，後方的物價不是按等速率的增漲，而是作加速率的增漲。這種現象在所有區域都是相同的。試以重要經營物價指數為例。如以戰前（廿六年上半年）指數為一〇〇，則廿七年一月份的指數約為一一〇；廿八年一月份約為一七〇；廿九年一月份約為三五〇；三十年一月份約為一，一二〇；三十一年一月份約為三，二七〇。由此可見我國戰時物價，一直在作加速率的增漲。

再次，就物價增漲程度的不齊來說，各種物品因供求的變化不同，結果價格上漲程度亦有很大的差別。有些物品的價格現在已到戰前的一百倍，而另一些物品的價格只到戰前的二十倍。至於薪金增加的程度，則去一般物價的增加程度甚遠。有些薪水階級現在的貨幣收入還不到戰前的兩倍。

這種加速率的不齊一的物價高漲，結果對生產、分配和其他方面都發生重大的影響。

在生產方面，物價變動到差現在的程度，不但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可以促進生產，反而構成擾亂生產的一個重要因素。這可從兩方面講：第一，由於物價變動，後方商業的利潤遠較其他各業的利潤為大。結果使大量的資金與人力流到商業方面。商業獲得的資本與人力愈大，則工業農業等所獲得的資本與人力就愈小。即使商業全是正當的經營，這已經是一種畸形的現象。何況事實上後方